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The Grape's Practice

The Grape Wine's Culture Origin and Structure Reproduction of a Small Plain of South Yunnan

葡萄的实践

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

郑向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Grape's Practice

The Grape Wine's Culture Origin and Structure Reproduction of a Small Plain of South Yunnan

葡萄的实践

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

郑向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的实践: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郑向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1241-7

I. ①葡… II. ①郑… III. ①葡萄酒—文化—云南省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734 号

书 名: 葡萄的实践:

一个滇南坝子的葡萄酒文化缘起与结构再生产

著作责任者: 郑向春 著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241-7/Q · 012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34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田野归去来

(丛书总序)

彭兆荣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根除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无论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问学方式的“范式转型”,人类学界对于这些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充分,此处不予赘述。

“田野”首先是一个异乡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由母体养育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研究。“归去来”不啻为形象描述;它已非陶公《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独善其身式的隐居,而是人类学学科的公共规约。

“田野归去来”表现为一个身体践行的组合行为,其目的和目标具体而切实,它不是乡村旅游,也不是生态旅游,而是人类学者通过最为简单的“归去来”方式,一方面参与观察对象的文化全景,另一方面“朝圣”般地奉行学科旨意,“炼狱”般地进行身体考验和心灵拷问,最终通过“主位—客位”的双重考试。

田野作业同时也是民族志所通行的“质性研究”的简编版本。费孝通先生以“解剖麻雀”予以概括,生动而贴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长时间深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小社会、小族群,本质上与研究复杂社会、复杂人群有共通之处,仿佛细胞之于身体机能。

人类学“小社会”的实地研究决定了其“在日常中发现异常和非

常,在平凡中体会不凡和非凡”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者不仅能体验到“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感”,习得田野作业的技巧和技能,获得对“异文化”的认知,也体现了人类学整体研究的旨意。因此,“现场”成为一个关键词,它是“田野”的根据地。

“现场”表现为特殊的结构场域,包含历史、传统、文化、生态、民俗等“历时—共时”全景,是特殊人群、族群生活的场所;遂为民族志者最基本的“工作作坊”。甚至人类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现场”性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建构工作。所以,“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色泽交映。

于是,“实证”便成为一个有限性概念,它关乎用“客观”的手段和技术寻找所谓的“原真性”。而二者皆由人完成。天下之事皆为“事实”,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事实”作判断必然人言言殊。对于任何人文学科来说,“实证”的最大公约数是学者们对“真实性”判断所呈现的启示录。

藉此又将当今民族志范式的转型和实验民族志带回到民族志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原生性层面,也带出了“实证”之重在于获取可资验证的“事实”,还是“事实之后”的阐释诸热话题;逻辑性的,人作为实证工作的主体和介体,即“身体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研究视域。“每个人都是典型”,是谓也。

回眸“本土”实景,人类学“舶来”中国已近百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在这一学科的历史“引渡”中苦苦求索“中国化”的生长机理。然而,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百年孤独”的际遇,致使其直至今日仍给人以在“西装”和“长衫”的组合中未及“美美与共”之境,尽管其中不乏偶尔精彩的亮相。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需重“三线组合工程”,即人类学知识谱系与国际人类学同步伸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特色之机理和进行扎实的田野个案研究。人类学界有“大/小人类学(家)”之说,“大”者,侧重建构“文化语法”,“小”者专事民族志的精致案例。彼“大/小”非此“大/小”,没有高下类分。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研究要注重全球化视野中地方、族群与民族国家互动所生成的新的文化质丛(英文为 cultural complex,意思是文化元素的集结和组合)、新的文化样态以及跨文化对话与理解。毕竟,传统“不变的社区”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越来越难以存

续。如何在多维视角中保持民族志范式和法典,各种实证、实验和实践已属必然态势。

本丛书即是“田野归去来”的果实,呈现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文化事象时所激发出新的阐释力、理解力和方法论。全面贯彻以上“三实”(实证、实验、实践)的原则,既遵循传统民族志范式的基本义理,又兼顾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所生成的新景观,以中国的文化“语法”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工作。

本丛书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人类学与乡土仪式”、“人类学物质研究”以及“人类学、遗产与旅游”,从三个研究视域出发,管窥人类学特色,展示国内一批年轻学者立足人类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努力,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本丛书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本人近十年来带出来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敢“专美”,因为那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作品以实证为据探讨人类学学理、学问和学术。丛书部分体现了本人的学科理念、学术专长和教学风格,更是作者们个性化的呈现。其中有些弟子受到过人类学大师的指点。他们是正在成长的一代。

任何实验和实践都包含摸索的意义,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可以在人类学学科之内,也可以在诸学科交叉领域,还会对那些未入行的蓄势待发者产生影响;这种启发包含着激发新一辈对“小地方,大事务”乡土社会的关注,并产生对人类学图景的憧憬和“入行”的热情。

任何事业都是代际性的,因此,顺利的代际交接是保证一个学科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对这一代“导师”教学效果的测试,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在特定、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教学之于特定时期教育体制的历史反映。我们没有理由和能力超越历史。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多元、多样、多彩,成形于“多元一体”的自在与自觉;成就于“自我的他性”的实在与实体。“田野归去来丛书”正是对这一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一体的探索和思考、实验和实践的集体献演。让我们为之喝彩吧!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历史真实、叙事与实践 / 16

第一节 历史与结构 / 16

第二节 历史真实 / 17

第三节 历史叙事 / 23

第四节 实践、文化与经济 / 30

第二章 葡萄里的小地方与大历史 / 41

第一节 葡萄的社会生活 / 42

第二节 葡萄的身世：放置进全球化情景 / 51

第三节 坝子里葡萄酒的地方化表述 / 63

小 结 / 74

第三章 葡萄中的历史叙事 / 76

第一节 重复不断的集体叙事 / 77

第二节 “缝补”历史断裂的个人叙事 / 97

第三节 历史叙事的本质与策略 / 109

小 结 / 120

第四章 葡萄的实践逻辑 / 121

第一节 坝子的关系性结构 / 121



第二节 葡萄实践的权力逻辑 / 132

第三节 葡萄实践的文化逻辑 / 152

小 结 / 177

第五章 事件与结构的倒置：跨越一个世纪！ / 178

第一节 葡萄的逆向旅行 / 179

第二节 结构的实践运作 / 194

小 结 / 208

第六章 消费葡萄酒：爱葡萄酒，还是爱故事？ / 210

第一节 葡萄酒消费中的文化指喻 / 211

第二节 坝子里不同情景中的葡萄酒厂 / 213

第三节 坝子外葡萄酒消费的形成 / 217

小 结 / 228

结 语 / 229

参考文献 / 231

后 记 / 237

图表目录

图

- 图 1.1 高原坝子里的葡萄园 / 11
- 图 2.1 坝子里的“玫瑰蜜”葡萄 / 41
- 图 2.2 坝子里酿出的葡萄酒 / 46
- 图 2.3 法国人在云南修筑的“米轨”铁路 / 55
- 图 2.4 “云南红”储酒的橡木桶 / 63
- 图 2.5 “米轨时光”里的品酒间 / 64
- 图 2.6 青砖灰瓦红酒庄 / 65
- 图 2.7 坝子里的“酒神” / 71
- 图 2.8 酒庄中的“阿细” / 72
- 图 3.1 叙事中的历史真实 / 83
- 图 3.2 茨中教堂背后法国人种下的“玫瑰蜜” / 85
- 图 3.3 传教士的“神赐之旅” / 94
- 图 3.5 葡萄中的历史叙事 / 113
- 图 4.1 “玫瑰蜜”种植示范户 / 147
- 图 4.2 YBY 的葡萄酒农庄 / 159
- 图 4.3 夜晚忙于葡萄节排练的妇女们 / 165
- 图 4.4 坝子里最大的寺院“南乡神佛寺” / 168
- 图 5.1 澜沧江峡谷中的村落 / 179
- 图 5.2 掩映于大核桃树下的茨中村 / 180
- 图 5.3 茨中教堂 / 181

表

- 表 1.1 人类学视域下的历史研究分类 / 19



表 2.1 国营弥勒东风农场机构设置 / 45

表 2.2 人类学论述中历史与情景的对照 / 52

表 4.1 历年农场提供“云南红”酿酒玫瑰蜜数量与金额统计表

/ 136

表 4.2 农场历年外销玫瑰蜜葡萄统计表 / 151

表 5.1 德钦县历年葡萄产值产量统计表 / 196

表 6.1 “云南红”酒庄年接待旅游者人数 / 217

绪 论

“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正是民族志对物的研究”。^① 人类学自 19 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学者们对物的考察兴趣和研究旨趣。受 19 世纪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携手的历史影响,西方在同广大的非西方地区与族群频繁的接触与碰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西方/非西方、殖民者/被殖民者、雇主/劳动力的二分类别,在这些不平等的关系中,人类学者对于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着野蛮、原始与落后的价值判断与时代隐喻,此时的物在研究者眼中是古代愚昧的“他文化”,是活着的原始部落,是还未进化的那一部分人的标志和标本。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人类学对于物的进化论研究策略才开始转变,进入到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学者们更为关注物的社会体系而非物本身,物以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工具或技术手段的面目出现,以满足人们适应不同生态与社会环境的基本需要。在此,物被用于探讨、描述和说明一种社会情境,反映一种社会关系、政治与经济系统。此刻,学者们考察的是“人怎样制造物,物如何造就人”。^②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也从功能主义时代进入到结构和象征人类学时代,学者们对物的关注也从“好用”(good to use)转而到

①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ed.,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2.

② Christopher Tilley, et al,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6.



“好想”(good to think)的层面,着重强调物上所附丽的制作者的意识、观念与期待,同时,通过物所提供的时空线索来识别与认知族群认同与地方文化。

由此看来,人类学的研究进程毋宁说是对物进行的历史。然而,纵便是人类学家们一刻也不曾离开过对物的描述与考察,纵然是物的问题一直渗透在人类学的研究与讨论中,对于物的研究却始终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界才开始对物进行系统的谱系梳理与理论强调。追溯其原因大致在于:一方面,早期的人类学者将物视为“原始”的文化遗存(survival),并着力进行收集与分类,以此作为进化论民族志撰写的重要证据。尽管这一研究模式后来被学者们抛弃,然而这种抛弃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便是,任何试图对文化的要素进行描述、界定或反思,或是强调其连续性的做法,都很容易被看做是那种人类学早期研究模式的派生”。^① 学界对物质文化苛刻的审视态度,使得随后各学派虽然在其理论研究与范式探讨上总是绕不开对物的描述与解释,但是却从未将物特意挑选出来进行强调与思索;另一方面,自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以来,转型社会中的人们依照马克思所赋予生产以自然、技术、功利的逻辑进行实践,使得功利主义最终成为人们体验现代经济,甚至是体验现代社会的主要方式,由此导致人与物异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物对于人而言没有感情、没有生命,没有附着任何道德与社会意涵,人们购买物品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实用性回报,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恰如福柯所言,正是由于现代人创造了一套脱离于世界并凌驾于世界之上的“自我表象”,所以物的切近已不可能。^② 因此,学界对于物质研究所持有的审慎态度,加之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物质与文化的分野观念,使得物虽然无处不在,却也并没有被放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

二

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质疑一切、肢解一切的“后”(post-)学时代中,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现代(post-modernism)、

① 彭兆荣、葛荣玲:《遗事物语: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② 王铭铭:《心与物游》,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后殖民(post-colonialism)等纷纷涌现,体现了社会学科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品质和根本理念。其实,反思与批评本就是社会学科引以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证据,从19世纪末开始,所有主要的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的作品,都包含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批评维度,如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及尼采,均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大众化生活和思想品质的自觉反思和批评。^①总的来说,社会学科的反思与批判存在两种类型:一是,针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与预想达到的社会进步信仰的反思与批评;二是,对现代生活、社会构造、文化形式的分析中,关于财富、资源、权力、地位的反思与批评。

伴随这股强烈的反思与批评学术浪潮的是,学者们纷纷转而对过去那些曾被人们忽略、甚至轻视的文化现象进行重新思索与探讨,希望从这些被遗忘的角落中,发现这些文化现象蕴含于其中、凭附于其上的特殊理念、历史价值与象征指喻。对物的重新思索与探讨便也囊括其中,拉都尔(Latour)和韦贝(Weibel)在新近的著述《物为公共——民主的氛围》(2005)中提出“物本民主”(object-oriented democracy)的概念,以强调回归对事物的研究(Back to Things)。这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宣言。^②

相应的,学界对于物的研究也由此进入了异彩纷呈的“后”学时代。

后殖民(post-colonialism)与物

后殖民一词最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讨论长期被西方殖民势力控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问题”(decolonization)，“post-”用于特别地指明资本主义国家在以直接霸占、控制与掠夺为特征的早期殖民阶段之后的一种新的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这种新的殖民方式更多的同某种隐喻与意识相关,而远非之前简单的可见可感的“强盗式”殖民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逐渐废除了它们在海外的殖民地,然而在这一早期的去

① 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彭兆荣、葛荣玲:《遗事物语: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



殖民化阶段,纷纷独立的国家却总是难于摆脱前殖民国家对其经济与文化上的影响与束缚,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新独立国家与西北欧与北美关系的学术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非洲裔社会学家阿明(Amin)提出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以及弗兰克(Frank)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①随后,学界纷纷展开了对于西方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批评,突出这些新主权国家本身的价值、传统与文化成就,强调这些曾经被殖民的国家需要意识到、辨别出西方殖民体系中自身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萨义德的《东方学》^②严厉批判了西方将东方“妖魔化”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权力和政治,成为后殖民主义反思与文化批评的基础文本(founding text)。萨义德以“殖民话语分析”(coloni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为其分析与批评的标签,在福柯指明“权力与知识最为直接的相互渗透”之后,萨义德进一步强调,“离开了权力,意识、文化和历史根本无从谈起”。^③继萨义德之后,对后殖民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盖瑞·斯比维克与霍米·巴巴,同萨义德一样,他们继续思考与探讨殖民话语中的本质性,斯比维克指出,萨义德的研究缺乏对被殖民者的关注,而试图从自己的著作《中尉能说话吗?》^④展开另一幅替换性历史的图卷;霍米·巴巴质疑殖民与被殖民之间明显的二分界线,认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模糊的中间地带,他将其称作殖民情景的“第三空间”^⑤,由此为后殖民的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

对应于学界对后殖民话语分析中权利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旨趣,学者们开始重视物在后殖民情景中的叙事,强调物所表达出的跨文化中政治、权力与表述之间的关系。西恩·赫迪斯在《物质文化和文化身

① Peter van Dommelen, "Colonial Matter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in Colonial Situations", in Christopher Tilley,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6, pp. 104—105.

② 萨义德·爱德华:《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③ Peter van Dommelen, "Colonial Matter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in Colonial Situations", in Christopher Tilley,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p. 108.

④ G. A. Spivak, *Critical of Postcolonial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pp. 19—39.

份的谱系》^①中强调,物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情景中有其相应不同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当它被置于历史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时,除了包含其自身的历史起源之外,还包含了其他民族多样性的社会文化要素。由此,为解读与诠释物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布莱恩·斯伯纳^②通过一张东方地毯探讨了物的本真性问题,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扩展与贸易,使大量的东方地毯涌入欧洲,在地毯的旅行过程中,织者与商人、制造者与消费者、东方与西方间的关系均发生了变化,西方将实用性、手工品、异国情调投注到这张地毯上,从而使地毯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意涵,对此,作者指出物的本真性是一种文化选择,表现了不同文化人们的某种欲求,人们赋予物各种意义与信息,随后又不断对其进行改写或重写。西尼·威敏茨^③论述了糖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时代中,在殖民地大量生产,随后传遍世界各地,糖的“泛化”(extensification)使其逐渐被吸收进人们的工作、娱乐、休息、出生、洗礼、婚礼等日常生活中和时间周期中,由此对糖的文化吸收与创造过程,形成各地风格迥异的关于糖的文化传记。何伟亚在《北京1860:劫掠、奖金和果报的神圣行为》^④中论述了英国殖民者在圆明园“欢愉”地掠夺之后,迅速将珍宝转移出它们的出生地并在中国市场和英国各拍卖行出售,出自中国皇家园林的宝物被异国买者和收藏者视为“古玩”,并不断玩味着由这些物构建的多重含义:它们象征了征服与优越、表现了羞辱与贬低、代表了奇妙的金钱价值与收藏价值、甚至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好玩”。刘禾^⑤通过梳理学者们对《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逊独自一人在荒岛上制作英国本土瓦罐这一细节的洞见,一方面批判欧洲对中国瓷器、丝绸、茶叶与印花布的嗜好伤害了自身的贸易与利益,而且摧毁了欧洲建立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通过鲁滨逊一人在荒岛上建构的朴

① 西恩·赫迪斯:《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谱系》,载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布莱恩·斯伯纳:《织者与售者:一张东方地毯的本真性》,载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

③ 西尼·威敏茨:《甜蜜与权力: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载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

④ 何伟亚:《北京1860:劫掠、奖金和果报的神圣行为》,载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

⑤ 刘禾:《燃烧镜底下的真实:笛福、“真瓷”与18世纪以来的跨文化书写》,载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



实而道德化的生活乐土,强调“殖民否定”。

人类学者对于殖民研究关注第三世界政治与文化的去殖民化过程,并且注意到许多殖民主义的概念在去殖民化后依然保持着影响,这促使他们将研究对象导向事物的表述与真实。其中最为突出的著作就是费边的《时间及其他者》^①论述了事物如何在时间与空间转变过程中显示出西方的权威性。阿帕杜莱通过对印度板球的分析展示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权利的运作模式,探讨了印度精英如何延续殖民时期的传统将外来的板球作为印度民族认同的对象,进而也延续了关于什么是印度人的话语权威。^②凯特潘蒂指出加尔各答的英裔印度人通过一种区分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neo-classical architecture)住房,严格同当地原住民开放式的住房区分开来,以此不断强化该城如今已经声名狼藉的殖民特性和殖民情景。^③皮特·范达明列举了曾经的法属殖民地摩洛哥在大规模的城市移民过程中,打着现代化旗号和保护当地传统文化建筑物的标签,将大量的法式建筑盖在当地传统建筑周围,目的是为了将城市的政治权利中心从老城镇转移到新区域中,今天的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便是在此殖民情景中建造,以至这些法国建筑所彰显的殖民权利话语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摩洛哥人。^④

相应的,这种对后殖民情景中文化间相互碰撞与转化在物上的表现与论述,也为地方文化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即附丽了后殖民意味的物如何在本土获得一种地方性的融合与理解。托马斯介绍了萨摩亚群岛人如何运用传统的文化与知识来对待来自太平洋的布料。正当18世纪晚期太平洋的布料逐渐取代波利尼西亚传统的树皮布料时,萨摩亚群岛依然普遍使用这种传统布料,当地人给予了它新的名字“tiputa”,意思是“赋予支持者以权力”,使其恰好成为了当地基

① Jon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 Its O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isity Press, 1983.

② 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第15页。

③ S. Chattopadhaya, “a Critic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Post-colonial World”, *Architronic: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Vol. 6, No. 1, 1997.

④ Peter van Dommelen, “Colonial Matter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in Colonial Situations”, in Christopher Tilley,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pp. 114—115.

督箴言的一种象征,当地人通过赋予传统物新的意义与功能,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传统。^① 皮特·范达明通过撒丁岛居民对与殖民事件相关的香炉、油灯意义的重新诠释,探讨了当地人如何通过物的意义置换构建自己的信仰与传统。对希腊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掌农业、结婚、丰饶之女神)的神祇祭祀是岛上最重要的信仰仪式,而且这一仪式传统被认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存在,直到最近人们对祭祀器物的关注,才发现其实仪式展演与神祇均同殖民密切关联,这些器物也都是希腊人,后来的罗马人的殖民遗物。^② 丹尼尔·米勒通过描述携带美国化与帝国主义意涵的可口可乐在特立尼达岛与地方性要素的融合过程中,使其成为极富民族主义色彩的饮料,在可口可乐地方化过程中,岛上的居民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用自己的口味展开同白人的对抗,在此,美国文化没有得到凸显,反而是特立尼达特色一再被强调。^③

后现代(post-modernism)与物

安东尼·吉登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④,并且强调现代性社会及其体制是同以往传统社会的一种断裂,这种断裂的主要表征就是经济相对于政治的独立,由此使经济获得了相当广阔的活动和影响空间。在经济指挥一切的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极度的异化,物之于人的意义只是在于工具性和实用性,只是为了人们能更适应现代生活。相应的,马克思所赋予生产以自自然、技术、功利的学理逻辑也为人们的经济理性实践提供了行动的准则与合理性。倒是早期人类学家对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了独有的贡献,莫斯的《礼物》通过分析物在非西方民间的交换与流动过程,强调了人

① N. Thomas, "Colonizing Cloth: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Nineteenth-Century Oceania", in C. Lyons & J. Papadopoulos, *The Archaeology of Colonialism*,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5, pp. 98—182.

② Peter van Dommelen, "Colonial Matter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in Colonial Situations", in Christopher Tilley,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p. 108.

③ 丹尼尔·米勒:《可口可乐:来自特立尼达岛的黑甜饮料》,载罗刚、孟悦:《物质文化读本》。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